

亲切的回忆和感受

陈述彭 院士 / 撰文

中国地图出版社(SinoMaps)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国营文化企业之一,是全世界教学地图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社,也是我国地图科学的培训基地。地图产品种类之齐全,印数之巨大,首屈一指。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树立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贡献很大,影响深远。为维护国家尊严,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弘扬民族文化,中国地图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经典之作。欣逢建社50周年的辉煌盛典,对于她为祖国和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作为一名地图科学工作者,我为中国地图出版社50年来的辉煌业绩深感自豪,也为50年来我与地图出版社的不解之缘而深感欣慰。从我进中学开始,至今一直是她的忠实读者。大学毕业以后,我开始成为她的作者;进入中国科学院之后,更有幸成为地图出版社的一名“职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的重托,担任编辑部的副主任,并联合当时大专院校的青年师生参加“大会战”。20世纪70年代初,我返回中科院,负责研制制图自动化设备,推广电脑辅助制图的工作。地图出版社的同事们对此表示出极大的热忱和关注,终于打破传统观念,克服小比例尺地图多样化的困难,实现了编辑出版流程的计算机作业和自动化,并出版发行了电子地图和多媒体产品,构建了

现代化的新型工业,使我国地图出版事业适应了“数字地球”与全球化的浪潮。如今,中国地图出版社巍然屹立,与时俱进,自立于世界出版业之林,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从读者到作者

近代地图的公开发行,始于清代湖广总督胡林翼,他率先将宫廷秘藏的内府舆图刻版问世。后来由湖南新化邹氏家族创立武昌“亚新地学社”,经营地图出版(源远流长,后来公私合营,成为地图出版社的成员之一)。他们出版的地图,就是我童年最早接触的地图。

当我初中毕业,报考湖南省立长沙高级中学的时候,有一道历史试题就是有关胡林翼的历史贡献的。对于所有的地理试题,我都喜欢用地图作为答案。例如,问:从上海到伦敦沿途经过哪些著名城市?我当时就默画出一张欧亚大陆略图,标明那些城市的位置和名称,口试时,受到了校长(兼地理教师)的夸奖。我的幼稚的空间形象思维能力,就是从邹氏地图中启蒙的。由此可见,中小学教学地图是多么重要啊!它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引发了我爱好地图、攻读地学的强烈兴趣。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华地图社在南京成立,由曾世英先生任社长。我在杭州浙江大学当助教时,和几位同仁一起绘制了一些三维的“西湖图景”,塑造了球面的全国立体模型,

受到了曾世英先生的青睐。于是,他交给我一些教学地图的绘制工作。首先是一幅小学地图册上的“北京鸟瞰图”,我当时虽然没有来过北京,还是认真地完成了任务;接着,我和郑威、吕人伟合作,彩绘了一系列中小学教学系列挂图,记得有《荆江分洪》、《都江堰》、《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以及《祖国改造自然的开端》,印数都超过10万份,畅销全国,曾先生很高兴。1954年我徒步考察自然地理分区界线时,走进太行山区山西晋城的穷乡僻壤里的一所小学,我们想在教室借宿,老师起初不同意,当有位同行告诉他我就是墙上这些挂图的作者时,老师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教学挂图显示了社会效益!

1949年,我酝酿编绘《中国地形鸟瞰图集》,计划提交给曾世英先生后,曾先生马上约我到南京面谈,由新华地图社资助,并指派章高炜、黄剑书二位高级工程师协助解决透视地图上手写特体注记的难题。我每星期提交一幅水彩原稿,主要是采取全球视角,立足于地球之外的一个支点,俯瞰地球的一角。这是在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前,根据对区域地形地貌的知识,凭借经纬线地图投影及高程控制,尝试描绘而成的一种臆念地图(Mental Map)。可没有想到,1954年这部小型地图集的出版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响”强烈,受到几位著名地图学同仁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这种鸟瞰地图的形式,

违背了“上北下南”方位的读图习惯,是“不科学的”;甚至“上纲上线”,说是“立场问题”,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为了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为地理学报的编委,我要求把这些批判我的文章登了出来,最后写了一篇解释和答复的文章(地理学报,第21卷,第1期,1955年),说明鸟瞰地图在技术上确有缺陷。然而同样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事隔44年之后的1998年6月,美国地理学会邀请我和家人专程去密尔沃基,给我颁发了奥·米纳地图科学金奖,同时受表彰的还有美国地图学家罗宾逊(R. A. Robinson),认为我们是分别代表东西两半球,在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之前,通过“科学的方法”,从太空描绘大地,创作“臆念地图”(Mental Map)的地图学家。美国国会为我们能够顺利出行,还向驻华大使馆发出了优先签证的照会;当美国海关人员查验到这枚金质大奖章的时候,也向我们举手敬礼,表示祝贺。如果说《中国地形鸟瞰图集》为我国地图科学事业赢得了国际的认可,那么这份荣誉首先应该归功于地图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和大力支持,归功于曾世英先生的精心栽培!

国家大地图集编辑部

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订了《12年国家长期规划》,竺可桢副院长倡议编纂国家大地图集,列为“04”重大项目,由中国科学院与国家测绘总局合作,聘请50名专家组成编委会,组织实施。国家测绘总局白敏副局长任副主任,刘德隆处长和我担任学术秘书。1958年,在地图出版社成立国家大地图集编辑部,由地图出版社总编张思俊兼任编辑部主任,刘德隆先生和我兼副主任。吴忠性、胡毓钜教授负责地图投影的设计研究,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地理系分别由毛赞猷教

授、李海晨教授、缪鸿基教授领队参加会战。中国地图出版社著名编审陈潮、凌大夏、黄秉成等在当时都全力投入了工作。此外,还聘请了苏联地图专家加蕾耶斯卡娅指导工作。白敏副局长亲自指挥组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征求对国家大地图集设计方案的意见。苏联提出合作方案,周总理指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设计编制”。于是,国家测绘总局在三里河办公楼发动群众,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评审对普通地图集编制方案的意见,还组织了分组竞赛,进行等大与放大编图技术方案的对比实验……济济一堂,盛极一时!在跨部门的红红火火的大会战中,普通地图集的设计方案数易其稿,修改达12次之多。资料组派出大批青年同志,分赴全国各省甚至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调查现状资料变化情况。当时试图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大搞科学实验,其场面是十分激动人心,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

普通地图集的编绘任务,终于在1969年坚持完成。早期完成的东中部省区的1:150万比例尺的普通地图原稿,由钱金凯同志等改编为《中国自然地理基础地图》,全国统一投影分幅共计64幅,由国家测绘总局作为临时版,填补了新中国新一代1:100万地理图(内部发行)的空白。在改编过程中,南京大学地理系师生协助解决了海陆衔接的问题;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在华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和西部盆地,采用了加密辅助等高线(灰色)的创意;编辑部为内流、外流水系的选取,参照降水分布、岩性特征制订了指标体系和等级,并为城市和居民点选取,参照人口密度及交通、河流网络,以及综合文化、政治特点,提出了定量的上、下限指标。可以说,这是我国普通地理图上实现定量地图概括的初步尝试,也大大提高

了这套地理图的科学水平和实际应用价值。这些科学研究实验成果,在国家大地图集的设计资料汇编(共13册)中都有较详细的记录。这些具有一定深度的技术创新,使国家大地图集编辑部的许多同志荣获了国家测绘总局“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回想起来,在地图出版社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国家大地图集编辑部为普通地图集做了大量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工作,对于我国普通地理图的编制,做出了一些历史性的贡献,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经过近20年的努力,国家大地图集的自然、农业、经济、普通地图集相继问世,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图集和各部门的专业(或专用)地图集陆续出版,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地图出版社出版的。

我国在国际地图界的声誉明显提高,受到了国际地图学协会(ICA)的尊重和表扬。胡毓钜、李莉两同志先后当选为副主席,我和廖克教授代表中国地图界先后荣获2001年和2003年度最高荣誉奖,中国地图出版社更是功不可没的“后台”。

中国地图出版社是我国地图文化的化身,是她为我们提供了地图的启蒙教育;是她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和工作园地;还是她,开拓了新中国的地图科学事业。50年来,她大力发展教学地图,支持科学地图,自立于世界出版业之林,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我以个人亲身经历描述的这几个事例,不过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地图出版社50年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业绩,有目共睹。我衷心向她表示庆贺!祝愿她与时俱进,日新月异,更加兴旺发达,为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贡献,也期待进入太空时代和信息社会的中国地图出版社能够再铸辉煌! 